

代人·共情·沉浸

《不说话的爱》听障世界的建构策略

文都静 刘泽甫

视,才能倾听,这种景别选择无疑是对小马视角的模仿。

相比于视觉上的代入,声音层面的处理则更加直观。导演不止一次对影片中的角色台词、音响效果等进行消音,从而在短时间内将观众的听觉体验无限拉近小马的听觉感受。在小马因听障而在工作期间闯入女客人的酒店房间时,导演将女客人的谩骂消音。那一刻开始,观众与小马一样,虽然听不到女客人讲话的具体内容,但却更能体验角色身上的那种窘迫与无助。这种视听上的接近,使观众得以跨越与小马生理上的客观差异,完成对于听障患者的错位代入。

共情:角色形象的道德审判

影片中的小马为了证明自己具有对女儿木木的抚养能力,经朋友介绍认识了做“大生意”的赵老板。赵老板以帮小马开具资产证明为条件,威逼利诱小马参与犯罪活动,通过伪造撞车现场骗取保险金。让主人公从事犯罪活动在一般情况下是违背人物形象的创作逻辑的——犯罪行为往往意味着道德的严重偏离,会导致观众在观看时拉远与角色的心理距离,难以对角色共情,进而无法进入由该角色主导的故事。因此,导演在叙事时有意识地弱化了小马因生活困境而走上犯罪道路的中年人身份,相应地,强化了其为为了维系家庭生活而不惜自损身体健康乃至道德准则的父亲身份。遵纪守法是社会共识,而做一个好父亲同样也是社会共识。两种身份所产生的道德挣扎与心理矛盾,丰富了对于小马道德判断的维度。小马的犯罪行为从为了留住女儿开始,到为了女儿能够拥有更好未来结束。以女儿的幸福成长作为全部犯罪动机的小马,以极端的方式完成了一个隐忍、付出、不求回报的“慈父”形象的建立。

此外,无论是初次目睹犯罪现场时下意识的阻拦行为,还是犯罪结束后决裂式的自首意愿,都表现了小马身上强烈的正义感,不仅使其明显区别于一般犯罪分子,而且更加强化了小马作为一个父亲所做出的牺牲。诚然,针对小马的犯罪事实,法律的判决无法逃避且不容置疑。但当法官在法庭上的宣判坐实小马违法身份的同时,女儿木木在法庭上撕心裂肺地哭喊无疑是对小马父亲身份的肯定。这种针对其双重身份所做出的不同道德判断,势必随着家庭叙事线索的强化而使小马作为父亲获得更多观众道德认同与心理共情。

沉浸:回避苦难的温情世界

当观众能够顺利代入小马的听障角色并共情其父亲身份后,便会开始关注该角色所处的故事世界。值得肯定的是,导演一定程度上回避了关于苦难的书写与贩卖。不同于沙漠本人执导的同名短片中以灰黄色主导的低调的影像表达,影片在绝大多数场景中采用了高影调的表达方式,为观众在视觉上营造出了一个明亮、温暖的银幕世界。其背后所折射出的是听障人群能够与健全的听人同样在生活中克服困境、乐观向上的温情期盼。

除此之外,导演多次借用木木的视角,对听障人群在生活中遭受的苦难完成了孩童视角的全新建构。在木木眼中,灯光下不断变换成各种小动物的手影代替了生硬冷漠的手语动作,因听力障碍引发的“打斗”也成了溢满笑脸的游戏场景。在游乐场里,木木送给小马一只鲸鱼造型的玩具口哨。小马发出“鲸鱼没有声音”的疑问,而木木则是用充满童真的语言回答“它的朋友可以听到”。这不仅是木木与小马挚友般父女情感的佐证,亦是导演对听障人群根本困境提出的解决方案——只要愿意和他们成为朋友,耐心交流,听人和听障人群就可以互相听到对方的声音。这种充满童话色彩的叙事方式,必然吸引着观众沉浸其中,体验属于听障人群的温情世界。

导演通过影片所建构的“听障世界”,能够让更多听人看见并关注听障人群的生活,能够让更多听障患者重拾对于生活的信心与希望,已然为那片无声的阴郁天空,涂上了一抹难得的亮色。

(郝静静:山西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北京大学访问学者;刘泽甫:山西大学文学院2024级硕士研究生)

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 电影文化研究部专版

《向阳·花》： 失去力度的女性互助

文/周夏



清明节假期看的两部影片都涉及聋人,也都涉及犯罪,底层的困境是面对社会现实的无奈,如何挣钱、如何生存是主人公考虑的第一要素,动机都是为了女儿,不惜以身犯险,但表现的侧重点不一样。《不说话的爱》里的父亲是聋人,主打父女情,通过父亲的一桩桩遭遇让我们感受到聋人的世界,更像是一部向听人普及聋人常识的公益性质的影片;但《向阳·花》并不主打母女情,虽然女儿是聋人,母亲也是为了女儿跟踪入狱,但因女儿被丈夫遗弃到福利院,母亲与女儿的互动几乎是缺失的。影片刻画的是曾经误入歧途入狱又重返社会的女性群体,重点演绎的是白狐狸和黑妹之间一波三折的狱友情,主题是时下流行的女性互助。影片因为是冯小刚导演的新作和赵丽颖再一次饰演狠角色,吸引了大众的目光。

看完之后,《向阳·花》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出彩,整体有点无感。《不说话的爱》虽然故事简单,但在剧情集中,情感浓度比较大,再加上张艺兴饰演的聋人爸爸和李路按饰演的女儿之间的情感互动还是很催泪的。但《向阳·花》里明明展示了那么多女性苦难和女性困境,作为泪点比较低的观众,我为什么没流泪呢?细想一下,电影里的苦难都是蜻蜓点水的,比如白狐狸的婚姻悲剧是一句台词交代的,为了给残疾的弟弟换亲,她嫁给了残疾的男人。比如片尾被老爹为赚钱工具的孕妇们是通过简单的几个镜头呈现的,虽然这与剧情主线无关,但是整体的轻描淡写也使整部电影失去了重量,何谈批判的锐度!

尤其是比较理想化的结局,神秘狠辣的黑老大“老爹”轻易被白狐狸砸成重伤,又碰巧与狱友胡萍的稀缺血型相同,胡萍起初不愿意献血,在爷爷切切讲述了白狐狸和黑妹的好人好事之后,胡萍流着泪伸出了援手。这种强行安排的女性互助太刻意了,结果呢,非但没有感动观众,反而让观众笑出了声。问题的关键在于影片不是为

了人物去编织情节,而是为了情节去编织情节,人整体被淹没在事中了。甚至让观众觉得白狐狸和黑妹骗钱变捐钱的前戏就是为了最后的献血存在的,胡萍最终救了白狐狸一命,可是如果胡萍不是这个血型呢?这个叙事的善心,而非生活本来的逻辑。

翻看了一下史安写的《向阳·花》原作——“女监里的向阳花,开出了高墙外”,文笔是朴素的纪实文学风格,以狱警邓虹为核心,写了四位女性互助的故事。但是改编为电影之后,明显增加了戏剧化,胡萍的故事充满了,郭爱美的故事被大幅度删减,怪不得在影片中这个时尚女孩出现得特别突兀。同时,影片也为一号女主角白狐狸增加了拼命挣钱的心理动机,她要为听力障碍的女儿买人工耳蜗,以凸显她作为母亲而被诱骗犯罪情有可原。当然,最后极端的暴力事件和出狱后的风平浪静也是后改的,假设结局没有那么幸运呢?堕入更深的深渊,也许更能启发人深思。但是,电影总要给人希望,呈现向阳之花的开放。这个明亮的结局是否是主创的第

一选择,就不得而知了。

电影把叙事线集中在白狐狸和黑妹之间的情谊上,这个选择是对的,否则原作太散,很难聚气。黑妹和自己的女儿一样都是聋人,白狐狸因此怜惜她保护她,二人之间的姐妹情也掺杂着一种类似母女的情感。出狱之后,二人临时组建了一个家,抱团取暖。影片隐藏最深的一个情节节点在于黑妹是伪装作哑的正常人,在她误以为白狐狸要自杀之际,她喊出了自己的秘密,这也透露出她从小被训练成执手的残酷环境。

该片最大的亮眼之处是兰西雅饰演的黑妹,这个人物塑造地相对复杂饱满。影片通过闪回交代了她的前史,她与老爹的关系,与小哥的情感,矛盾丛生,有爱有限,让人纠结,这个小偷家族的暗势力始终隐隐让人有一种不祥之感。兰西雅也演出了这个女窃贼生猛的原始野性,但善良的初心尚未被泯灭,给倒在病榻上的胡萍奶奶捐款,宁可冒着被暴露的风险,也要帮白狐狸挣钱养女儿。

对比之下,赵丽颖的表演基本合格,比较一般化,可以看出她很努力地

在拓宽自己的表演疆域,从《第二十条》《浴火之路》一直到《向阳·花》,甩开青春乖巧的偶像包袱,尝试饰演聋哑人、妓女、女犯人等边缘小人物,这种勇于突破自我局限的转型值得肯定,但在这部新片担纲第一女主角白狐狸的表现却差强人意,人物性格简单直白,比较单向度,表演也浮于表面,对抗社会不公待遇的反应比较单一,缺乏变化。当然,这也与剧情的铺设有关,影片没有用影像交代白狐狸的前传,也没有展示她复杂的心理变化,更没有她和女儿情感互动的温馨画面,为女儿赚二十万买人工耳蜗也就沦为一句空洞的口号,很难引发观众的共情。

无论在影像上还是在叙事上,《向阳·花》都呈现出一种电视剧的质感,大情节中套嵌着小情节,人物之间产生矛盾又演化为矛盾和解,虽然这是一部关注特殊女性生存困境的影片,但是表现得中规中矩,毫无创新之意。这也无意中透出冯导创作的疲态,从中感受不到主创表达的激情,而只有完成基本任务和规定动作的惯性。

《风云山林》： 找回亲情 找到信仰

文/李春利



飞驰的马蹄声打破了1930年陇东庆城城的寂静,百姓一片惊恐,但来人的目标显然并不是他们。原来桥上山土匪窝,土匪下山找郎中。

电影《风云山林》的剧情就这样在全秋的季节拉开序幕。故事从“郎中”宋先生上山开药方治病救人讲起,隐喻的却是战乱年代无助的人们同样急需一剂安国利民的良方。这一次“出诊”,真实身份为红军游击队指导员的“郎中”宋先生,不仅治愈了桥山上的瘟疫病人,也帮助土匪首董金龄和她的上百个兄弟找到了人生的方向:南梁根据地。

甘肃南梁,是中国革命史上的一座丰碑,西北高原的红色地标。20世纪30年代,西北大地满是灾荒与战乱,国民党统治与军阀、土匪割据并存,贫

苦的百姓或是落草为寇,或在贫瘠的土地上艰难耕种。人们迫切需要找到一条道路,结束朝不保夕的生活。陇东南梁游击区红军游击队作为陕甘边红色武装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展了艰苦卓绝的武装斗争。

除了借鉴传统战争片的情节铺陈,《风云山林》把这一复杂厚重的历史背景融入传奇故事:一个为反抗黑暗聚众山林的“土匪世家”,在共产党所领导的红军队伍的引导、扶助下,最终百川归海走上革命道路的故事。

以小人物映照大时代,用小切口呈现大主题,让人命运和时代风云相呼应,是《风云山林》的艺术追求。影片通过一个女性的视角来讲述她和红军从“打交道”到“共谋大同世

界”的传奇故事。女主角董金龄在片中经常蒙面出场,却难掩性格的豪爽智慧、爱憎分明。作为土匪后代,父亲去世后,上百个兄弟的命运压在她肩上;从小带大的侄子要打自己的天下一走五年没音信,再次见面却是已经另立山头打家劫舍到家门口,在国民党的威逼利诱下,姑侄反目一触即发;本想和她远走他乡过太平日子的二当家孟大哥离她而去。一连串打击让她意识到,连年战乱,桥山并非世外桃源,在乱世里寻活路,仅有胆识是不够的。

影片在处理人物命运转折时并没有简单粗暴,而是真实细腻地展现了生死存亡关头,一个肩负重任的女性从抗拒、警惕到绝望、怀疑再到坚信不疑的过程。

几次和“郎中”宋先生过招,董金龄早已识破了对方的身份却不为所动:“从别的山头的土匪到军阀的兵,从国民党到它的走狗民团,多少人想占我桥山,拉我队伍。谁想打桥山的主意,除非从我尸体上踏过去。”直到侄子以大哥葬礼为由诱惑姑侄入伙,后被红军游击队解救。在国民党、军阀等各方势力的角逐中,董金龄带领桥山兄弟毅然投奔南梁根据地的传奇经历,是当时时代大潮下的一个缩影。

“打天下是为了啥,打自己的天下又是为了证明啥?”片尾,已经变身宋指导员的“郎中”宋先生一语灵魂发问惊醒众人。被国民党逼上绝路的侄子带领队伍重回桥山,和姑侄一番较量之后,却发现这里处处都是姑侄俩温暖的回忆,找回亲情的同时,也找到了信仰。

土匪聚义,丛林策马,围攻伏击,为了把这种特殊生存环境中的转折做得大气流畅,《风云山林》在视觉效果营造上可见用心。山体、村落、窑洞等自然环境,和古建筑、城楼、野外战场等人造景观融为一体,成为那个年代那一群人的人生大舞台。

近一个世纪过去了,南梁那片红色热土上红色旅游蓬勃发展,南梁根据地的故事还在以不同方式代代相传,电影《风云山林》就是其中的一个。

莽莽苍苍的桥山梢林,浑厚壮阔的陇东大塬高坡,跌宕起伏的命运传奇,真实鲜活各色人物,一起在影片中化为撼人心魄的力量,带领后人追忆那段难忘的岁月。

(作者系光明日报文艺部常务统纂、高级编辑)